

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内容的真实程度及对焦裕禄事迹的传播与影响

王梓舜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焦裕禄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书记，在他去世后 60 年的时间内，一直被树立为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在焦裕禄事迹的众多报道中，穆青等人撰写的通讯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新闻学界研究的对象和学习范本，这篇佳作既有大胆独特的尝试，也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但其树立起来的“焦裕禄”形象与其真实经历或多或少地存在不一致之处。本文从焦裕禄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其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探究与焦裕禄相关的史实真相，并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形象的树立的意义及影响，结合政治传播与认同的视角深入剖析其形象跨越时代而永不过时的原因，既为今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服务，也对当下的人物通讯报道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播；焦裕禄精神；人物大通讯；史实真相；形象认同

Abstract: Jiao Yulu was an outstanding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a good secretary of the people. For 60 years after his death, h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odel for cadres and the masses to learn from. Among the numerous reports on Jiao Yulu's deeds, the famous long-form news "Jiao Yulu: A Model County Party Secretary" written by Mu Qing and others is an object of study and a learning model in journalism. This excellent work not only has bold and unique attempts but also distinc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image of "Jiao Yulu" established by it is more or less inconsistent with his real experiences. Starting from Jiao Yulu'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his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truth related to Jiao Yulu,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his image is timeless across er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It not only serves

Received: December 23, 2025

Revised: January 06, 2026

Accepted: January 11, 2026

Published: January 24,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the better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Jiao Yulu's spirit in the future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character news reports.

Keywords: Communication; Jiao Yulu's spirit; long-form character news; historical truth; image identity

1. 引言

焦裕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杰出代表，是党中央多次号召全国党员、干部学习的模范典型。在他就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期间，带病坚守岗位，在防沙治害、党群互助等领域创下不凡业绩，为当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自1964年焦裕禄同志逝世至今的60年间，记录其事迹的通讯报道、文学作品、影视改编层出不穷，他所凝聚的精神力量跨越时空，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已然成为我国近代史与党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焦裕禄事迹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离不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耕细作。其中，穆青、冯健、周原三位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堪称焦裕禄事迹宣传的“开山之作”。作为较早系统报道焦裕禄事迹的文本，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使得当代公众熟知的诸多焦裕禄经典事迹均源于此篇通讯^[2]。然而，学界与业界长期以来对该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存在持续讨论，部分细节与史实的差异引发了关于典型人物报道边界、新闻真实性内涵的深入思考。辨明这些争议背后的历史逻辑、叙事策略与传播动因，不仅对还原历史风貌、深化精神传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当代人物通讯报道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2. 历史语境：特定时代下的“焦裕禄”需求

任何典型人物的出现与传播，都离不开具体历史语境的滋养与塑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诞生，并非偶然的新闻实践产物，而是深刻回应了196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重困境与核心诉求，其传播逻辑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媒体使命密切相关。

2.1 经济困境中的精神动员诉求

1958年初至1960年秋，我国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左”进程中断，反右倾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剧了“左”的错误影响。与此同时，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滑，据考证，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较1957年下降约26.4%，河南、山东等受灾严重地区更是出现了普遍的物资匮乏与饥饿现象^[3]，这一时期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步进入恢复期，但至1966年初，社会经济与国家实力尚未完全恢复，城乡各地仍可见荒凉萧条的景象。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肩负着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使命，而树立模范典型人物形象，成为当时以小见大、实现精神激励的有效路径。正如大通讯作者之一的穆青所言：“当时，我们国家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又经过‘大跃进’浮夸风，真是天灾人祸，有人分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民不聊生……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必须用舆论引导群众战胜困难……我就想寻找这种典型，激励人民，战胜困难”^[4]。在经济困境引发社会心态低迷的情况下，亟需一个具象化的精神符号，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力量，而焦裕禄带病扎根灾区、带领群众抗争灾荒的事迹，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2.2 “信阳事件”后的公信力修复需求

1960年前后发生的“信阳事件”，成为塑造焦裕禄典型形象的关键政治背景。这一事件中，河南信阳地区因时任地委书记等领导干部虚报产量、强制征购等错误决策，导致严重饥荒，据学界考证，事件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十万之多^[5]。作为建国后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信阳事件”不仅暴露了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更对地方党组织与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信阳地区的县委书记群体中，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撤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降至低点^[6]。

对于始终坚守“党和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穆青而言，“信阳事件”的发生令其痛心疾首，也使其深刻意识到重塑干部形象的紧迫性。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县委书记作为县域治理的核心力量，其行为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与群众认同^[7]。因此，寻找并塑造一位“亲民爱民、廉洁奉公、实干担当”的县委书记典型，成为修复党群关系、重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路径。正如方提、尹韵公在研究中指出的，“一定要写一个好的县委书记，把党的形象挽回来，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找回来，把失去的部分民心补回来”，这一认知逻辑与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初衷高度契合，而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实践，恰好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理想范本。

2.3 新闻宣传的时代使命与实践转向

1960年代初，我国新闻事业的核心功能是服务于国家建设与政治传播，典型人物报道作为“以点带面”的有效传播模式，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任务^[8]。1965年10月，《人民日报》开办“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专栏，尽管全国有904个县委的领导同志参与撰稿，但部分文章逐渐陷入内容空泛、脱离实际的困境，专栏影响力亟待提升。时任《人民日报》副主编的李庄意识到，亟需一个具象化的典型案例为专栏注入活力，这一想法与穆青寻找“时代典型”的诉求不谋而合。

焦裕禄的事迹经基层传播后，很快进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视野。1964年5月焦裕禄逝世后，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撰写的《一个党的好干部》一文，引发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关注，随后分社派记者赴兰考采访并形成长篇报道，于1964年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刊发，《河南日报》随后全文转载并配发社论^[9]。这一系列前期传播为大通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65年4月，穆青向河南分社记者周原布置豫东重灾区采访任务，周原选择兰考并在当地采访12天，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打动。1965年12月，穆青一行赴兰考深入采访，在查看焦裕禄遗物、听取当事人讲述后，三位记者迅速完成通讯、评论与社论的撰写，经相关领导批准后，于1966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10]。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大通讯的诞生是新闻宣传回应时代使命、实现实践转向的必然结果，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为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提供具象范本，推动政治传播与社会动员。

3. 文本建构：大通讯的叙事策略与真实性多维阐释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为典型人物报道的经典文本，其成功不仅在于对核心精神的精准捕捉，更得益于精妙的叙事策略。对于文本中部分与史实存在差异的争议点，需跳出“绝对事实还原”的单一认知框架，从事实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多维视角进行客观阐释，才能全面理解其叙事逻辑与精神价值。

3.1 叙事策略：典型场景与精神内核的具象化表达

大通讯的叙事建构遵循“困境—行动—精神”的逻辑主线，并通过三类典型场景的精心塑造，实现了焦裕禄精神的具象化传递。

其一，“抗争自然困境”的实践场景。文本聚焦焦裕禄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地的核心实践，通过“冒风雪考察沙丘”“带头种植泡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细节描写，凸显其“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的精神品质。尽管原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回忆称，“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还是留点余地好”，而周原当时认为“已经留有余地”并未采纳这一意见，但这类表述差异本质上是典型人物报道中“艺术真实”对“事实真实”的合理补充。原兰考县委宣传干部刘俊生曾提及，“穆青一直说，焦裕禄的精神非常好，如果焦裕禄精神能够宣扬出去，兰考的面貌也总要有点突出的表现；没有这个兰考新貌，焦裕禄精神也不好表现”^[11]。这种叙事选择并非对事实的刻意歪曲，而是为了通过场景强化，让抽象的精神内核获得更具感染力的表达载体。

其二，“亲民爱民”的情感场景。文本中“焦裕禄走进梁进财家低矮的茅屋，看望病中的老人，当老人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的细节，虽可能存在对话的艺术化加工，但精准传递了焦裕禄与群众的鱼水深情。穆青在采访中被这一情感内核深深触动，“几乎哭出了声”，并明确了对焦裕禄的定位——“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的榜样”^[12]。这类情感场景的塑造，突破了单纯的事迹罗列，通过情感共鸣拉近了典型人物与受众的距离，使“亲民爱民”的精神品质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

其三，“坚守信仰”的精神场景。文本对焦裕禄带病工作、临终牵挂兰考发展的细节进行了重点刻画，包括“枕头下的《毛泽东选集》与《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表述。尽管任彦芳回忆称这一细节与事实存在出入^[11]，但这类叙事本质上是对“无私奉献、坚守信仰”精神内核的提炼与升华。作为人物通讯，其核心使命并非复刻所有生活细节，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选择，凸显典型人物的精神特质，实现从个体实践到群体价值的升华。

3.2 真实性的多维辨析：事实、历史与艺术的辩证统一

新闻真实性的内涵并非单一的“绝对事实还原”，人物通讯作为兼具新闻属性与叙事特征的文体，其真实性必然包含事实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多维层次^[13]。具体到大通讯的文本分析，本文认为，需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辩证审视。

在事实真实层面，文本确实存在部分细节与史实的偏差。根据任彦芳的回忆与考证，除“兰考面貌改变”的表述外，“焦裕禄半夜跟张钦礼谈心”“焦裕禄召开县委委员会后带大家去火车站”等 11 处细节均与事实存在出

入，甚至焦裕禄逝世后枕头下的书籍也与文本描写不一致。需要说明的是，任彦芳的史料在学界存在一定争议，其回忆的主观性与局限性已被部分研究者指出^[14]。通过交叉验证周化民、刘俊生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可知，这些偏差多为“细节重构”而非“核心事实虚构”——焦裕禄带领群众治沙救灾、亲民爱民、廉洁奉公的核心实践，得到了所有当事人的一致确认^[9]，兰考县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文件也印证了其主要工作业绩的真实性^[15]。因此，这类“事实性误差”并未否定文本的核心事实基础。

在历史真实层面，文本精准捕捉了 1960 年代的时代特征与核心矛盾。无论是经济困境下的精神动员需求，还是“信阳事件”后的公信力修复诉求，大通讯通过焦裕禄的形象塑造，完整呈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心态、政治诉求与发展困境^[16]。杨奎松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历史文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个别细节，更在于是否真实反映时代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趋势^[17]。从这一角度而言，大通讯虽在个别细节上存在艺术加工，但整体上实现了对历史语境的真实再现，是“历史真实”的有效载体。

在艺术真实层面，文本通过叙事提炼实现了精神内核的升华。人物通讯的核心价值并非“复刻事实”，而是“传递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力量”。大通讯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在尊重核心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场景的选择、情感细节的强化，集中凸显了焦裕禄“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性真实”恰恰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核心使命，也是其能够跨越时代、引发广泛共鸣的关键所在^[18]。因为叙事的说服力不仅源于事实的准确性，更在于其是否符合受众的价值期待与精神需求，能否通过故事传递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

4. 传播效果：从政治动员工具到精神丰碑的演化

大通讯的传播过程并非简单的文本扩散，而是经历了从即时政治动员到长期精神传承的演化历程。其传播效果既体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响应中，更沉淀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神传承里，形成了独特的传播路径与深远影响。

4.1 即时传播：政治动员与民心凝聚的双重成效

大通讯于 1966 年 2 月 7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后，迅速形成“官方推动—媒体扩散—群众响应”的三级传播模式。在官方层面，党中央的认可与推广为传播提供了政治背书；在媒体层面，各级党报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连续播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覆盖；在群众层面，文本引发了

强烈的情感共鸣与社会响应，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学习焦裕禄的专题活动，仅 1966 年上半年，全国就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专题学习会议。

从传播效果来看，大通讯完美实现了当时的政治动员目标。在经济恢复阶段有效提振了社会士气，缓解了困境带来的精神消沉；在“信阳事件”后修复了党群信任，重塑了基层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为“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提供了具象范本，推动了政治传播与社会动员的深度融合^[16]。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统计，大通讯发表后的三个月内，全国收到群众来信近 10 万封，大量信件表达了向焦裕禄学习、投身国家建设的决心^[19]，其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传播效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4.2 长期传播：从典型人物到精神符号的升华

对于时效性极强的新闻通讯而言，大通讯能够跨越数十年仍保持旺盛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形象从“具体典型人物”升华为“抽象精神符号”，这一演化过程本文认为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一是媒体再现的持续强化。自 1966 年以来，各类后续报道、文学作品、影视改编不断丰富焦裕禄形象的传播载体，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传播热潮。1990 年电影《焦裕禄》上映后引发全国观影热潮，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2014 年电视剧《焦裕禄》在央视播出，进一步扩大了年轻群体对焦裕禄事迹的认知；《刘俊生：我“偷拍”的焦裕禄》《焦裕禄身后几十年鲜为人知的故事》等纪实作品，通过挖掘新的细节、补充多元视角，使焦裕禄形象在传播中不断沉淀、丰富^[20]。这些后续传播并非简单重复大通讯的叙事，而是结合不同时代的传播特征与受众需求，持续强化其精神内核的普适性。

二是精神内涵的时代适配。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内涵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而不同时代的传播者会根据当下需求侧重不同的精神维度。上世纪 60、70 年代提出学习焦裕禄时，往往强调其“又红又专”的阶级出身与革命忠诚；改革开放以后，突出其领导兰考人民救灾生产的实干能力与担当精神；21 世纪以来，则重点宣传焦裕禄的清廉为官与理想信念^[4]。这种“核心内涵不变、时代侧重调整”的诠释方式，使焦裕禄精神始终与社会需求同频共振，避免了形象的僵化与过时，实现了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4.3 传播争议的正向价值：推动精神内核的深度确认

大通讯引发的真实性争议，并未削弱其传播效果，反而成为推动焦裕禄精神深度传播的重要动力。一方面，争议促使学界与公众重新审视典型人物

报道的边界，深化了对新闻真实性内涵的理解——从单一的“事实还原”转向事实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多维认知^[21]，推动了典型人物报道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争议引发了对焦裕禄事迹的再挖掘，除任彦芳的回忆外，兰考县档案馆公布的原始资料、焦裕禄亲属的访谈记录、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等多元史料，进一步印证了其核心实践与精神内核的真实性。

这种“争议—考证—深化”的传播过程，恰恰证明了焦裕禄精神的真实生命力。它的价值并非依赖于文本细节的绝对准确，而是源于焦裕禄实践中真实存在的精神内核，以及这种内核对不同时代的普遍启示。正如陈力丹在研究中所言，典型人物报道的长期生命力，“不在于细节的完美无缺，而在于其精神内核能否持续回应社会的价值需求，能否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精神滋养”。

5. 历史回响：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价值与实践启示

2024年是焦裕禄同志逝世60周年，大通讯的发表也已近60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焦裕禄精神不仅没有褪色，反而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当代价值既体现在精神传承层面，也为当下的人物通讯报道提供了重要启示。

5.1 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承价值

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内涵——“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能够持续回应当代社会的核心需求。

尤其是在干部作风建设层面和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体现的极为突出。“亲民爱民、廉洁奉公”的精神为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价值标杆。焦裕禄“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为新时代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提供了生动范本。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的精神为应对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方法指引。兰考县近年来依托焦裕禄精神传承，大力发展泡桐产业、推进生态治理，实现了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文明城市”的转变，印证了精神价值向实践效能的转化。“无私奉献、坚守信仰”的内核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精神资源，成为激励当代青年担当作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动力。

这种传承价值的延续性，本质上源于中国社会对“好干部”的永恒期待。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青天”情结^[22]，到新时代“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标准，

民众对“亲民、实干、清廉”干部的诉求一脉相承，而焦裕禄形象恰好成为这种诉求的完美投射，使其精神具备了跨越时代的适配性。

5.2 对当代人物通讯报道的实践启示

大通讯的写作实践与传播历程，为当代人物通讯报道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核心在于把握三重平衡：

其一，事实真实与精神真实的平衡。当代人物通讯报道应坚守核心事实的真实性底线，以扎实的采访、多元的史料交叉验证为基础，避免主观虚构与核心事实歪曲；同时应认识到，人物通讯的核心价值在于传递精神力量，在尊重核心事实的前提下，可通过典型场景的选择、情感细节的提炼实现精神内核的升华，避免陷入“细节堆砌”而忽略精神表达的误区。大通讯的实践证明，唯有实现事实真实与精神真实的辩证统一，才能让典型人物既有事实支撑，又有精神感染力。

其二，政治导向与群众共鸣的平衡。典型人物报道往往承载着一定的政治传播使命，需要呼应时代需求与政策导向，但这种呼应不应以“符号化、空洞化”为代价。大通讯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具象化的情感场景与实践细节，实现了政治导向与群众共鸣的统一^[21]。当代报道应借鉴这一经验，聚焦典型人物的“生活化实践”与“情感化细节”，让典型形象“接地气、有温度”，避免将其塑造成脱离现实的“完美符号”——近年来《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传播实践证明，兼具政治属性与情感温度的典型形象，更能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同与主动传播。

其三，单一文本与多元传播的平衡。大通讯的长期传播证明，典型人物的生命力需要多元载体的持续赋能。当代人物通讯报道应构建“文本报道+新媒体传播+实践转化”的全链条传播模式：通过深度报道奠定事实基础与精神内核；利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扩大传播覆盖面，增强年轻群体的参与感；借助线下实践活动、主题教育、事迹宣讲等形式，实现精神内涵的实践转化。这种多维度的传播体系，能够使典型精神从媒体文本走向群众生活，实现从“被知道”到“被认同”再到“被践行”的传播升级。

6. 结论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为典型人物报道的经典文本，其价值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精神符号，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特定历

史时期新闻实践、政治传播与精神传承的重要样本。从历史语境来看，大通讯的诞生是经济困境中精神动员、公信力修复需求与新闻宣传使命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文本建构来看，其通过典型场景塑造实现了精神内核的具象化表达，其真实性应置于事实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多维框架中辩证理解；从传播效果来看，文本经历了从即时政治动员到长期精神传承的演化，争议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其精神内核的传播；从当代价值来看，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内涵仍能回应当代社会需求，为干部作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滋养。

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逻辑在于，其生命力并非源于细节的绝对完美，而是源于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对核心价值的坚守以及对群众情感的深刻洞察。在当代语境下，传承焦裕禄精神，不仅要铭记其“治沙救灾、亲民爱民”的具体实践，更要把握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立场与“实干奉献”的精神本质。而借鉴大通讯的实践经验，当代人物通讯报道应在坚守真实底线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导向与群众共鸣的统一、事实呈现与精神表达的衔接、单一文本与多元传播的协同，让典型精神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 穆青, 冯健, 周原.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N]. 人民日报, 1966-02-07(1).
- [2] 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45-47.
- [3] 曹树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1): 14-28.
- [4] 张慧芳, 王昉. 穆青自述[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 189.
- [5] 杨奎松. “信阳事件”的历史考察与反思[J]. 史学月刊, 2016(1): 78-88.
- [6] 方提, 尹韵公. 历史的碎影: 为什么是焦裕禄?[J]. 国际新闻界, 2021(6): 90-105.
- [7]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形态与逻辑[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56-157.
- [8] 刘海龙.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289-290.
- [9] 孟兰英.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问世前后[N]. 解放日报, 2014-06-10(7).
- [10] 张严平. 穆青与名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诞生[J]. 档案春秋, 2022(8): 37-38.
- [11] 任彦芳. 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3, 119-120.
- [12] 贾关青. 穆青与焦裕禄“三部曲”[J]. 百年潮, 2020(5): 70.
- [13] 陈力丹. 典型报道的传播规律与媒介责任[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5): 5-18.

- [14] 盛亚军. 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焦裕禄"的史实与形象[J].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5(1): 34.
- [15] 兰考县档案馆. 焦裕禄档案文献汇编[G].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22: 89-92.
- [16] 方师师. "调整时期"的新闻实践与政治传播——以 1961-1965 年《人民日报》为例[J]. 新闻大学, 2020(2): 89-98.
- [17] 杨奎松. 历史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J]. 史学月刊, 2018(1): 5-13.
- [18] 李斌. 焦裕禄精神的时代内涵与传承路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3): 124-132.
- [19] 张严平. 穆青传[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15.
- [20] 殷晓章, 卫红春. 刘俊生: 我"偷拍"的焦裕禄[J]. 新天地, 2014(5): 24-25.
- [21] 刘海龙. 大众传播中的叙事与真实建构[J]. 国际新闻界, 2019(8): 45-60.
- [22] 唐世杰, 许开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青天"情结探析[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 45-48.